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谷小水
编

朱执信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谷小水
编

朱执信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朱执信卷/谷小水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300-20433-8

I. ①中… II. ①谷…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朱执信 (1885~1920)-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7715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朱执信卷

谷小水 编

Zhu Zhixi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印 张 35.5 插页 2

字 数 559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澍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 1840 年到 1949 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朱执信，名大符，字执信，笔名有蛰伸、县解、前进、民意、琴生、去非、无名等。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理论家。就其一生事功而论，无论是身体力行参与武装斗争、推翻专制统治方面，还是启迪民智、阐发革命理论、从事革命宣传方面，均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1885年10月，朱执信出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朱启连，能诗善文，才气横溢，曾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职，有多种著述行世。母亲汪若昭，广州文化名人汪琮之女，幼承家学，文词兼通，与丈夫有唱和之雅。朱启连因崇慕康熙年间山东学者赵执信，给自己的第三个孩子取字执信。

朱氏夫妇非常重视子女教育，自幼便向执信讲授历代兴革利弊及英雄人物事迹，注重人格培养。同时指导执信循序渐进，广泛涉猎国学典籍，打下传统学问根底。在父母的指导下，朱执信不仅在传统学术上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且爱国主义情愫破土而出，潜滋暗长。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仅九岁的朱执信向父亲探问交战情形。翌年获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失声痛哭。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朱执信虽僻处南国，但究心时局。《辛丑条约》签订后，他极为悲愤，认识到“覆亡之祸，迫在眉睫”，力挽狂澜之根本在于推翻已沦为洋人朝廷的清政府。在此背景下，他大量阅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反清复明史书，并亲自镌刻一枚“南都沦后第四乙酉生”印章，以寄寓反清之志。反清思想初步形成。

1902年，朱执信入教忠学堂学习。在校期间，主攻国学，兼修英

文、日文、数学、历法等。课余时间，则与同学古应芬、汪兆铭等组织“群智社”，以探求新学为职志。在一群志同道合好友的相互促发下，他大量研读《物种起源》、《天演论》、《原富》等近代西方各种思想名著，对《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新式刊物也手不释卷，思想面貌焕然一新。

1904年，朱执信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广东省官费赴日留学资格。年底，与胡汉民、汪兆铭、古应芬等联袂东渡，翌年初入东京法政大学附设法政速成科第二期学习，主修理财科。在学期间，除学问精进外，置身日益激进的留日学生群体，朱执信与胡汉民等“与共晨夕，为学问道义之切磋”，彼此“极意探求”革命方略，然犹未得“实行之要领”。

是年7月，孙中山自欧洲来到日本。朱执信、胡汉民、胡毅生等广东法政生慕名来访，晤谈一下，极为拜服，自此奉为革命导师。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朱执信即时加入，且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员。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为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以《民报》为阵地，先后刊发多篇重量级文章，一则与改良派展开论战，驳斥谬说，鼓吹革命；一则阐释与宣传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据吕芳上先生研究，《民报》前五期所刊载的有关民生主义的文字，“值得重视的十篇文章中有半数是朱执信的撰述”^①。自此，朱执信文名大噪，并以博学多识、才气纵横、论证严密等卓拔才情在革命党人中脱颖而出，一跃而为第一流的革命宣传健将。

1906年6月，朱执信以优等成绩自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毕业，随即返回国内，先后受聘于广东高等学堂、广东法政学堂、两广方言学堂等新式学堂，一边教书一边革命。其间，朱执信明则泯然众人，一袭旧派人物装束，暗中则影响学生、运动新军、联络会党，宣传革命思想，聚集革命力量，组织筹划过多起在广州及其周边的武装起义，扮演着广东革命领导者的角色。在1911年4月发动的黄花岗起义中，他身先士卒，跟随黄兴攻入两广总督署衙，血染战衣。武昌起义爆发后，朱执信一面组织民军会攻广州，一面利用兵临城下之机运动水师提督李准反正，成功地促成了广州的和平光复。

广东光复后，朱执信积极协助胡汉民组织政府，出任军政府（后改都督府）总参议。履任期间，他殚精竭虑，席不暇暖，主持裁编民军，

① 吕芳上：《朱执信与中国革命》，72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

治理财政，参与改革省议会，剿平各地盗匪，为广东地区的政权建设及社会秩序的恢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13年宋教仁被刺，革命党内部意见纷纭，朱执信极力赞同孙中山“非去袁不可”的主张，力主武装讨袁。并在复杂局势中利用与陈炯明的师生之谊，最终促成广东地区打出了讨袁的大旗。

“二次革命”失败后，朱执信流亡日本。他利用难得的闲暇，努力自修，有针对性地钻研经济学；同时协助编辑《民国》杂志，积极从事舆论讨袁工作。待国内局势稍稍平靖，又遄返国内，开展武装革命活动。

1914—1916年，朱执信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组织领导广东地区的讨龙斗争，先后策划发动过多次针对龙济光的暗杀与起义。1916年10月，龙济光残部败退海南岛，彻底结束了在广东地区的统治。对于朱执信在驱龙斗争中的功绩，胡汉民谓：“龙济光之蹶于粤，执信之力为多焉。”^①

1917年护法运动发生，朱执信追随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主持秘书处工作，负责处理中枢事务，兼顾军事联络。1918年孙中山受排挤蛰居上海，朱执信随同前往，协助从事理论撰述。五四运动爆发后，为因应新文化运动，孙中山创办《建设》杂志，朱执信担任主要编辑。在承担繁重的刊物编撰工作的同时，他充分发挥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博学多才等优长，笔耕不辍，连续在该杂志刊文20余篇，臧否人物，议论时政，接引新思潮，阐发三民主义，首屈一指的革命理论家与宣传家的风范显露无遗。

1920年粤军回粤战争中，朱执信是重要的发动者与参与者，是孙中山联络、促动陈炯明的主要桥梁。是年8月，陈炯明在福建漳州誓师，宣布回师广东讨伐桂系，粤桂战争爆发。随后朱执信奉孙中山之命，马不停蹄赶赴港澳，组织办事机构，就任讨桂军总指挥，负责协调、指挥各路民军及地方军队，响应援闽粤军回粤。9月，为运动虎门驻军独立，与吴礼和深入虎门，积极活动，成功促成炮台守军于16日宣布独立。21日，因虎门降军与民军发生冲突，局面混乱，不避危险，赶往现场力为调控，不幸在变乱中为乱枪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5岁。

消息传至上海，孙中山极为痛惜，长叹道：“执信是革命中的圣

^① 林家有：《朱执信》，86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人”。9月24日，在复谢持电中又谓：“前星期虎门独立，邱渭南、执信前往主持，正为快意；不料一部民军内变，竟将执信击杀，闻报之下，痛惋难言，虽尽歼桂贼不足以偿也。”后来，孙中山还多次在函电、演说中论及朱执信殉难对国民党造成的损失，谓：“执信忽然殁折，使我如失左右手”，使“我党失此长城”；称其是“最好的同志”，“为中国有数之人才”^①。曾长期共事的胡汉民称誉朱执信是“忠于主义的一个人，最革命的一个人，追随着总理最肯奋斗的一个人”^②。另一位重要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认为：“死了一个朱执信，全世界的人，在进化的道途上，失了一个很有力量的推进器。”^③

作为20世纪前20年革命党群体中极为重要的思想家与宣传家，朱执信所从事的理论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致力民众思想启蒙。

清末民初，受几千年专制统治的中国社会蒙昧主义盛行，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有见及此，朱执信将启迪民智，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基础性工作。他积极宣传进化论，打破社会万古不变的僵化认识；大力弘扬科学，破除封建伦常及宗教神学等各种权威；高扬人的价值，倡导人改造社会及国家的自觉自动，从而为新文化运动的推波助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朱执信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无所谓绝对，无所谓永远，“随时演变”，始终处于进化的途程之中。地球及人类都是物质不断演化的产物。人类社会同样处在不断的进化与发展过程之中，职是之故，“现在如果是想永远保存着一个秩序，就是想叫一个社会永远睡着。把一个时间的社会静态变了化石，令他永远没有进步，那是不特无益并且不可能。况且大地还有冷下去的时候，太阳还有消减变灭的时候，那有不变的化石，那有不不变的社会”。

朱执信指出，所谓“伦常”，所谓“秩序”，究其实质，“皆欲以一终古不变之规绳，驭转变无常之人类社会”，其结局“惟有祸患贻人类而已”。打破旧伦常，当然是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应有之义。对于渐成国人思想禁锢的西洋偶像——基督神学，他同样无情揭破，指出经由进化

①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12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② 林家有：《朱执信》，161页。

③ 戴季陶：《怀朱执信先生》，《朱执信先生殉国九周年纪念刊》，2页，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1929。

论，“则知宇宙中经无数进化而始有人，绝非被上帝创造者”；新旧教所供奉的教主耶稣，是为了需要而制造出来的偶像，与历史上的耶稣完全不同。他告诫青年，切勿“中宗教的毒”，不要当“神的奴隶”。他认为，当今之世，惟有反对偶像崇拜、与宗教对立的科学“神圣不可侵”，“科学之效用，可以垂之久远，可以普适于现所知之世界”。然而当一种科学如果不容人“随时讨议”，则不幸沦为另一种偶像，也必须无情打破，只是“打破科学上偶像者，惟以科学之研究可以得之，此外皆不能成功”。

人的价值启蒙同样是朱执信启蒙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影响“生存价值之元素”归纳为“九事”，并逐一剖析，指出人生的苦乐与价值固然包含个人性的因子，更与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息息相关。良善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皆为增加生存价值而生”。反观现实，朱执信大声疾呼：“今日中国民之生存价值，正日趋于下……而此日下之原因，大抵基于不良之政府”，“冀其改良政府之一事实现，乃可以次及其余。是则生存价值之一转变之机也。吾中国人其尚未觉知此生存价值减少之痛苦者乎？抑感知之而无意于将来者乎？其将于亡羊补牢之计有所择也？吾急欲得此四万万之答案”。

（二）全面阐扬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革命党人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政治纲领，是当时先进中国人奋斗不已的精神动力。自追随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后，朱执信所做的理论方面的基本工作，就是结合时代主题，从具体问题出发，深入阐释与宣扬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他在这一方面的持续努力，既有力地推动革命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扩大了革命党人的影响，也使三民主义理论的内涵更为清晰显豁。

如民族主义方面。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清政府与改良派在立宪问题上的互为呼应，朱执信撰写多文，一条条分缕析，剖陈清廷统治下的中国绝无实行立宪的基本条件，揭破所谓立宪不过是“愚弄一世具”，根本目的无非为“保其大位”，对众多为所蒙蔽者无疑是一贴清醒剂。一面层层递进，阐释“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而是二者固相连属，第一目的既达，第二目的自达”，论证了此次革命虽高唱排满，实兼具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双重任务，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为本次革命之一体两面。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民族矛盾基本消失，朱执信笔下的民族主义

因时而变，论述的重点转向反对帝国主义。

1917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际，中国在美国的怂恿下向德国提出严重抗议，与德绝交并进而对之宣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此背景下，朱执信秉承孙中山命意，急撰《中国存亡问题》长文，指出追求一己之私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世界不安宁的根源，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侵略主义，中国参战，无论胜败，都存在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危险。所谓中国加入协约国，借机亲近美国，“以图公道之援助”，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皆为一丘之貉，“欧美之人言公道、言正谊者，皆以白种为范围，未尝及我黄人也。美为平等自由之国，亦即为最先倡言排斥黄种之国”。期望战胜后“收列席讲和之利益”，同样是国人的一厢情愿，因为“战胜者分配利益，以各国利害为衡，非以一时感情所能动”，“弱国而图依附强国以佳兵，即令得胜列席议和，犹是听人宰割”。就中国而论，既“可以避现时之厄，且可以为永久不败之基”的安全之策，实在“以独立不挠之精神，维持严正之中立”，避帝国主义战争而远之。

此后，朱执信又先后发表《侵害主权与人道主义》、《国家主义之发生及其变态》、《伯达铁路之过去及将来》、《朝鲜代表在和会之请愿》、《英国与波斯之新协约》等多篇文章，抨击帝国主义唯利是图、四处侵略；同情朝鲜、波斯等被压迫民族的不幸遭际及反抗斗争；呼吁国人“自觉”、“自振”，“使其国家随于世界之进步以为改良”；并极富前瞻性地预言，20世纪“一民族中之少数人，尚欲倚其与之反对之劳农所组成之武力为后援，以拥护其握有他民族奴隶使之之特权，真犹燕巢幕上，决无长久理矣”。在朱执信看来，“国家不为人类之最终生活形式，故对于本国以外之人民，以同在人类社会之故，不能不认其有同等之权”，他主张各民族，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均拥有独立和自治的权利。一国之内各民族的关系，同样应当秉承民族平等与自决的精神。

民权主义方面。辛亥革命时期，朱执信力证清政府视吾人为奴隶，必须以平民为主体，通过政治革命，推翻专制暴政，建立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窃占后，朱执信高举舆论讨袁大旗，连续刊文揭露袁世凯政权业已沦为“阀阅富豪所专，非平民所能与”，与民主共和体制完全背道而驰。针对当时流行一时、颇具迷惑性的“开明专制”论调，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近日言开明专制者，其志固在专制不

在开明也。”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朱执信关于民权主义的阐发主要集中在对代议制的重新认识与思考方面。通过对民国成立以来议会政治经验、教训的反思，以及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观察，朱执信认识到“有了国会便算民权，国会的权利增多就算是民权发达，现在看来，这种主张是很不完全的，很危险的”，“代议制不是理想的最善制度”；西方国家所实行的行政首长之拒否权与解散权、法官之废弃权，均非“真正”的救济之法。根本的救济之法，即在实行直接民权，使“人民直接参与政治”，“直接指挥政治”。

朱执信认为，直接民权应当包括创制权、复决权与罢官权，人民拥有这三权就可发挥无穷的威力，可以“解决一切政治争论”，“免政府用恶法以毒害人民”，可以使“政府归之人民支配之下，复回国民原本应有之主权”。为了保障直接民权的实现，一方面应弃集权，行分权，以县为单位实行地方自治，另一方面应制订一部能够体现人民意志、保障直接民权的宪法。

民生主义方面。辛亥革命时期，朱执信在孙中山社会革命思想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革命应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的主张。在狭间直树教授认为“最值得重视的”^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朱执信详尽剖析了社会革命的原因、与政治革命的关联以及中国应当并行之理由，指出中外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相依倚，成则俱成，败则俱败”。因为如果仅行政治革命，革命胜利后，“豪右之族跋扈国中，不转瞬政权复入于彼手”，很快就会回复到革命前的状况；而如果仅行社会革命，原有统治集团完全可以运用掌握的权力，“制为专利彼族之法，社会革命之效果亦归于无有”。当今中国，惟有并行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使二者交相为济，方能真正达成革命的初衷，使中国臻于富强之域。

关于社会革命的内容，朱执信着力从土地国有与铁道国有两方面予以阐发。他认为土地国有可以分阶段逐步实现，通过实现该政策，既可避免土地高度集中，亦可供给国家财政需要，“尽废诸税”。铁道国有则是将铁道经营权收归国家或公共团体，以保障“其经营皆以适应社会之需要而止，不如资本家经营之惟利是视也。其有收益为国家之饶，亦即

① [日] 狭间直树：《朱执信对孙文民生主义的理解》，载《近代史研究》，1991（3）。

以为国民之福利”。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朱执信对民生主义的认识也越出原有的框格，讨论的问题更趋广泛，并迭有新解。他认为，“社会的改造，从破除独占做起。自然生产要素里头，土地的独占性是最大”，平均地权是解决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关键，故“平均地权是社会主义实行之第一步”。此外，对于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众多方面，如实业发展、铁路建设、外资利用、农业改良、财政改革以及钱币发行等，亦均撰有文章逐一论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苏俄社会的映照以及五四运动的启发下，作为独立力量初登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也为朱执信所关注，成为其论述的对象。他敏锐地意识到工人阶级所蕴蓄的革命力量，指出“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离了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的力量”，“国家之中最有力者为人们，人民所归向者，始谓之实力”。针对中国劳动阶级“所受的痛苦、压迫比别的国民也要加多几倍”的苦况，他提出应当采取措施，改善劳动者的生存境况，保障所有人的劳动权和生存权，打破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旧的分配制度，“要把我们所主张的生产分配方法来换了旧日的生产分配方法，才可以算是我们的革命成功”。这样的认识与识见明显超出了同时期的其他国民党理论家。

（三）持续介绍马克思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输入中国的大潮中，部分国人开始翻译、介绍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朱执信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1905年11月，他在《民报》第二、三号上连载《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较为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思想主张，颇为详细地介绍了阶级斗争学说与剩余价值学说，还大段摘译《共产党宣言》，在各种纷纭杂出的社会主义诸学说中，初步区分出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

翌年6月，针对《新民丛报》攻击社会主义的“谬说”，他发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起而迎战。文章批评改良派对西方学说一知半解，故常以“今日之我”挑战“昔日之我”，认为不当以论者有限所见妄下断语，而应“知学派有异同，学说有变迁沿革”。朱执信显然熟知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发展流变，是以在该文中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辨析马克思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而在驳斥改良派关于社会